新史學二十三卷四期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在共產中國發現歷史——毛澤東時代中共農村革命史之西方研究述評

陳耀煌*

如何站在中國人自身的立場，探究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一直是西方學者的主要關懷。事實上，自 1950 年代西方的共產中國研究開展以來，學者就未曾忽略來自中國內部的歷史動力。1980 年代以後，「在中國發現歷史」，已成為西方共產中國研究圈內的主流趨勢。此一趨勢的源起與特色是什麼？其迄今為止的發展概況又是如何？本文將藉由梳理半世紀以來與毛澤東時代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相關的英語文獻，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關鍵詞：中共黨史、農村革命史、共產中國研究、地方研究、在中國發現歷史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迄今已超過一甲子，西方關於 1949 年以後共產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大抵也有相應的歷史了。許多著名的中國研究者，如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等人，早在 1950 年代就開始撰寫出版與共產中國相關的論文與報導。雖然當時他們的研究很難擺脫周圍恐共情緒的影響，最後也總是得出共產中國是一個極權主義(totalitarian)國家的結論，[1]但在這些學者的論述中，也不乏精闢的學術思辯，並非總是對外界政治的死板回應。

自 1960 年代起，西方的共產中國研究開始蓬勃發展。雖然此後直迄 1980 年之間的研究多是來自政治或社會科學家對同時代中國的觀察，其論述也不脫極權主義、現代化理論與革命史觀這三大典範的影響，但此一時期所留下的豐碩成果，著實為後來共產中國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1980 年代以來，由於中國的對外開放，西方的中國近代史與共產中國研究發生了極大的轉變。學者們在新公開資料之基礎上，反思過去佔據支配地位的宏觀理論。如在近代史研究方面，柯文(Paul A. Cohen)即撰書批評那些帶有西方文化偏見的現代化等理論，號召學者站在中國的內部，最好是從地方或下層社會，重新發現中國歷史。[2]在共產中國研究方面，何漢理(Harry Harding)也發現，1980 年代以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試圖「解構」中國。他們拋棄宏觀典範，投入微觀的地方個案研究，嘗試從中探尋某些自 1949 年以前即持續發揮影響

1 Tai-chün Kuo &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pp. 17-19.
2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p. 186.

力的內在歷史動力。[3]這些特徵與柯文的主張不謀而合，即「從共產中國內部發現歷史」。特別是在與農村革命史相關的研究上，此一趨勢更加明顯。究竟此一研究趨勢興起的根源為何？其主張又是什麼？該趨勢在 1980 年代以後迄今又有如何的發展？以下，我們試圖從 1950 年代以來西方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共產中國農村革命史研究切入，並將其分為四個階段予以探討，以一窺此研究領域的發展概況，並嘗試回答上述問題。

二、極權主義的極限

西方的共產中國研究，從一開始就沒有忽略中國內部的因素，即使在 1950 年代極權主義典範極盛的時期亦是如此。

極權主義典範係指共產國家透過官方的意識形態、由個人領導的群眾政黨，以及恐怖的警察機器，遂行無孔不入的全面統治。此一定義，最初是來自學者對蘇聯的觀察。當時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共有意在中國建立一個蘇聯式的極權主義政權，其對人民的全面控制，甚至超過蘇聯與前代中國的統治者，可謂青出於藍勝於藍。[4]

極權主義統治的有效性，端視國家機器現代化的程度而定。蘇聯典範所象徵的便是一個韋伯式的現代化官僚體制，而共產中國至少在 1950 年代前期也曾熱切地仿傚蘇聯建立一個正規化、制度化、合理化的現代國家。[5]然而，當時就有學者質疑此一論點，如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即認為共產中國與蘇聯般的東方專制政權(despotism)，

3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pp. 28-30.

4 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pp. 10-12.

5 Martin King Whyte, “Iron Law Versus Mass Democracy,” pp. 37-48.

出於治水的需要，原本就有一個強大國家的傳統，所以共產中國與蘇聯的專制統治，不過是向此一傳統的回歸，他稱為「亞細亞復辟」。[6]

魏特夫不認為蘇聯與中共的專制統治源自於現代化國家機器，相反地，他和當時的現代化理論類似，也認為西方現代化革命可以幫助中國擺脫亞細亞的復辟。在這裡，魏特夫借用了韋伯的觀點，也把中國描繪成一個強大的專制政權，具有一個壟斷既得利益的龐大官僚體制，其與社會之間及其內部係依據某些不正式的關係來維繫，它的基礎是建立在小規模的私有經濟制之上。這樣一個非理性化的國家與社會體制，本身既滯礙了現代化的發展，除非有外力的援助，其自身才可能發生質變，突破停滯的狀態。可惜，西方未及徹底改造中國，共產革命就爆發了。

魏特夫或許也期望中共可以帶領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因為毛澤東也像斯大林般，追逐城市的工業化，沒有把自己局限在農村。但是毛對於農村，卻恢復了傳統的專制統治。而且自 1950 年代中期以來，毛也像歷代君王般，動員大量群眾興修水利，其結果既沒有如預期般提高農業生產，還因為集體化政策破壞了小規模的私有經濟體制，降低農民生產動機，致效率下降，農村勞動力銳減，中國農業瀕臨崩潰，專制統治瓦解了自身的基礎。[7]

所以，現代化成為中共革命成功與否的判斷標準，不僅魏特夫如此想，楊慶堃(C. K. Yang)也是個例子。楊生於廣州，親眼目睹西方勢力對中國造成的衝擊。他深受韋伯影響，也期許中國能夠走上現代化之途，但他認為中國社會自身沒辦法達成此一目的。楊在 1934 年的碩士論文〈鄒平市集之研究〉中，就指出中國既存「自給自足的

6 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7 Karl A. Wittfogel, *Agriculture*, pp. 14-15.

經濟勢力」，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造成中國自身的不統一。[8]其他如既得利益的傳統官僚體制也是一種桎梏，楊認為只有革命一途，中國才能獲得解放。[9]

終於，革命來到了。1948 年，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多年的楊慶堃，應嶺南大學的邀請回國服務。他利用機會，在廣州附近的南景村做田野調查。1951 年返美後，楊利用田野調查資料，出版了幾部專著，探討中共建國初期的農村。楊發現，中共的革命確實為中國農村帶來某些現代化的變革，如統一了被宗族等既存機制分裂的農村、使農民具有全國性的視野，或改革傳統的婚姻等。但楊也注意到集體化政策給農村帶來的傷害，並造成新的官僚主義。[10]在後來另一部著作中，楊更作出了這樣的判斷，即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信仰」，永遠不能取代過去的「有神論」，起到安撫人心與穩定社會的作用。[11]由此可見，楊雖然依舊肯定共產革命有助於中國現代化的推動，但也注意到中國傳統的不可取代性及其正面影響。

楊慶堃做出上述論斷已是 1960 年代中期的事，當時西方的中國研究已步入所謂現代化理論時期。而且，許多學者也像楊慶堃般，批評中共沒能找到其意圖摧毀的傳統中國價值觀與體制的替代方案，致其追尋現代化的道路崎嶇坎坷。[12]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在中國農村集市的研究中即表達了同樣的不安。他指出，中共在 1950 年代曾先後試圖以國營公司、供銷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取代無所不

8 楊慶堃，〈鄒平市集之研究〉，頁 110、142。

9 C. K. Yang, “Introduction,” p. xli.

10 C. K. Yang,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 K. Yang,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11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pp. 402-404.

12 Tai-chün Kuo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p. 22.

在的傳統農村集市，但結果全部失敗，而且造成災難。施堅雅因而總結道：中國不得不在既存的、無生氣的傳統架構上，朝向社會主義前途邁進，農村集市在此一過程中展現了強大的韌性。[13]

楊慶堃與施堅雅的研究告訴我們，中國的統治者，無論他們如何企求現代化，也不得不與無法被取代的中國傳統妥協。所以，徹底的西方現代化難以實現，奠基在現代化國家機器之上的無所不及之極權主義統治也不可能。僅從共產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的設立，我們即可了解當時國家的深入是如何受到局限。這事實上也是早期中國研究者饒富興趣的一項議題。

眾所周知，在帝制中國，中央政府正式的控制僅達縣一級，在縣以下，則必須依賴與地方人士合作，進行統治；而且越是下層，越需要更多地尊重地方人士的意見，國家的影響也隨之愈益減弱與非正式化。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試圖把國家的觸角進一步深入農村，結果卻反而疏遠了農民，引起後者不滿，即所謂「國家的內卷化」。[14]

那麼，中共又是靠什麼機制深入鄉間呢？舒爾曼(Franz Schurmann)說，這從中共是以農村哪一級別為單位來推動運動，即可了解。如江西時期的中共是以人為的鄉或行政村為單位，足見當時中共也是較依賴國家的力量打入農村。到延安時期，中共改以自然村成立互助組，反映當時共產黨更著重由下而上的群眾動員，也更重視與既存的社經文化體制結合。但是，如果說中共只是利用既存的社經文化體制進行統治，那中共與封建王朝又有什麼不同呢？舒爾曼說，中共透過黨的機制與個別黨員，不僅打入自然的村落社群，還予以

13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II,” pp. 363-399.

14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改造，這就是中共與眾不同之處。[15]

中共建國初期，先後設立了區、鄉的基層組織。它們都是國家正式官僚體制的一部分，可是早期的學者如舒爾曼等人認為，中共的鄉沒有超過500戶，仍相當於集市規模，足見當時中共還是重視與既存社會機制的結合。即使是 1956 年中共號召成立的高級合作社，其規模也不過 100-300 戶，依舊符合集市規模，所以中共黨國至此仍未脫離社會。儘管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無論是鄉還是高級社，早已遠遠超過以上估算的大小。

到了大躍進時期，中共設立規模高達 3,000-4,000 戶以上的人民公社，早期的學者才指出中共黨國脫離了社會的實際。但是，這也只是暫時的現象，因為如此大規模的公社根本不能運作，如舒爾曼所言，「公社是幽靈，不是實際的事物」。所以，從 1959 年開始，中共又逐漸地把權力下放到生產大隊與隊，國家的基層政權又慢慢地和既存的社經文化體制結合一致了。[16]

從以上簡短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發現：首先，許多早期的西方學者認為，共產中國就如同封建王朝般，從未能完全擺脫與征服傳統的束縛。當然，這並未否認中共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強大黨國機器。例如，中共建國初期的土改，即遭到幹部與群眾地方主義情結的反彈。儘管如此，中共最後還是透過強力的黨國機器，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地徹底滲透地方，即使地方主義的情結也從未曾被完全消滅。[17]

其次，早期的中國研究者雖然對於現代化都抱持某種期待，但也開始欣賞中共革命所具有的某些中國特色。他們承認，共產黨的

15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pp. 412-437.
16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pp. 484-498.
17 Ezra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p. 102, 123.

組織、領導與意識形態，取代了舊的菁英領導，使中國有可能轉向現代化。但中共並未因此建立起一個韋伯式現代且理性化的官僚體制，因為共產中國是依賴群眾動員，而不是「規制化」的行政手段達成統治目的。[18]直至今日，許多學者仍舊認為，群眾路線的性格，正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可以走出一條有別於蘇聯革命道路的根本原因。

對群眾路線的強調，以及把研究視角從上層轉移至地方，原來便是相輔相成的兩條研究趨勢。如前述的施堅雅，甚至是更早的學者，很早就開始設想中國農村底層存在著某種經濟、文化上能夠自給自足的自發性社群機制(community)。[19]他們認為，外來的政治力量如欲以強力建構社群，必然遭到抗拒，乃至失敗，因為社群必須為其自身的目的而不是外在的權力而存在。[20]所以，除非與社群結合，否則國家不能穩固，革命也不能成功。這也正是國民黨所以失敗，中共得以勝出的關鍵。

學者塞爾登(Mark Selden)指出，中共在延安時期，透過互助合作組織，結合既存社群，高度地動員群眾，開創了他所謂延安模式的傳奇。[21]今天很多學者也許已不再贊同塞爾登的觀點，但延安模式確實反應了同時代學者的思維，即中共不是非得用韋伯式現代化的國家才能夠取代封建王朝，他們還可以選擇把黨國建立在一個更廣闊的群眾，以及地方的基礎之上。此一思維也為隨後 1970 年代的左翼潮流開啟了大門。

---

18 A. Doak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p. 437.

19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p. 272; Martin C. Yang, *A Chinese Village*, pp. 242-243.

20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pp. 402.

21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p. 196.

三、毛澤東的群眾路線

1970 年代的左翼學者以為，革命的潛力早就蘊藏在群眾當中，如塞爾登後來所言，「合作社的根深植在中國的土壤中」，中共應該到農村中把它挖掘出來，而不是從外面強加給農民。[22]但這並不意味著無須黨的領導，農民就會自己起來革命。根據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中國農民是自私的小農，是小商品生產者。小商品生產者雖然反對資本家，但也企求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其分散、狹隘與缺乏分工和協作的生產性格，更預示了中國的小農，如果不予以組織化，必然要走上墮落之途，這也是後來毛澤東推動農業集體化的理論依據。

學者韓丁(William Hinton)也是如此認為。1947 年，韓丁在中共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擔任英語教員。隔年，他作為土改工作隊觀察員參加山西省潞城縣張莊的土改運動，其成名作《翻身》即是根據此行的調查寫成。在此書中，韓丁表達了對中國小農經濟的不安。他說張莊農民生活一向貧困，也不乏抗爭的歷史，但農民沒有看到解決問題的根本關鍵，因為他們全是個人主義者，只顧著解決眼前個人與自家的問題，沒有人想到把各人的生產資料聚集起來，集體合作，解放生產力，根本打破持續貧困與階級分化的惡性循環。所以，韓丁悲觀地暗示，中共的土改也未能徹底解決問題，因為土改只是分配土地，沒有進一步把農民組織起來。[23]這實際上是中共官方的觀點，韓丁及同時代的左翼學者未加批判地就移植到其著作當中了。

果然在土改後不久，中共當局即批判農村中自發的資本主義勢力(富農經濟)發展起來，導致階級的再分化。所以，農業的集體化勢在

22 Mark Sel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p. 72.
23 William Hinton, *Fanshen*, pp. 54-57, 564, 586.

必行，但如何與何時推動卻眾口紛紜。據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所言，斯大林的蘇聯所以能在 1930 年前後迅速地完成農業集體化，主要就是依賴黨國機器的力量。中共當然可以仿傚蘇聯模式，但蘇聯模式引爆極大的赤色恐怖，造成經濟與人員上的重大損失，中共不能不有所顧慮，而最後予以否決，決定採取由下而上群眾路線的辦法。[24]

中共是依賴群眾路線而不是黨國機器去組織群眾，僅就這點，我們即可看出 1960 與 1970 年代學者間的不同。前述的施堅雅等人在論及集體化時，即指出中共理論上應先訴諸道德上的勸說，再以利誘之。但此一作法成本極大，所以中共通常是採取強力的手段，即訴諸國家的力量，鎮懾農民。[25]可是，1970 年代的左翼學者則認為，農民是自願參加合作社的，因為農民相信組織起來對自己有利。[26]中共也了解這一點，所以當局一開始即指示，要在農民自發、自願與有利的原則下，把農民組織起來。

在左翼學者看來，中共之所以知道如何做對農民有利，正是因為中共出身農村，比城市發家的聯共還要有農民基礎，也更了解農村與關心農民的需要。所以，中共並沒有像聯共般不顧農民死活，用黨國的力量，透過來自城市的幹部，強制地推動集體化與統購統銷政策；而是在保證對農民有利的前提下，漸進地透過地方幹部的培養與動員，使農民自願地參加合作社。雖然實際的情形並非總是符合此一理想狀態，過程中也曾發生過激的偏向，引起群眾的不滿和反抗。但相較於蘇聯，中國的集體化確實較有群眾基礎。[27]

---

24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pp. 101, 147.

25 G. William Skinner and Edwin A. Winckler, "Compliance Succession in Rural Communist China," pp. 410-438.

26 Vivienne Shu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pp. 326-328.

27 Thomas P. Bernstein, "Leadership and Mass Mobilisation in the Soviet and

當然，農村出身不能保證中共一定會走群眾路線，左翼學者認為，關鍵在於毛澤東。中共建國伊始，宣稱學習蘇聯老大哥，模仿蘇聯的治國模式，結果造成嚴重的官僚主義。毛對此難以忍受，決定發動群眾，挑戰新中國的官僚主義者，即毛的不斷革命論。[28]也正是因為毛的堅持，中共才否決了蘇聯模式，改採群眾路線的辦法。

但是，即使是高頌毛澤東群眾路線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毛走過了頭，導致大躍進的災難。可是他們依舊辯稱，毛雖然難辭其咎，但他的本意是好的，錯在於下層幹部的官僚主義與浮誇的不實報導，使得毛不清楚實際情形，以致釀成大錯。至少，毛和斯大林不同，因為蘇聯 1930 年代的災難是國家「故意地」剝削農民所造成。[29]

毛澤東的大躍進失敗了，新中國官僚主義的一面在 1960 年代初期再抬頭。此一官僚主義，是傳統中國官僚主義心態與現代化蘇聯黨國體制的結合，其規模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左翼學者回顧這段歷史時，非常同情毛澤東。因為他們以為毛所面對的挑戰，與他們相同，即一個不公不義的社會，以及脫離群眾的國家體制，還有侵略亞非落後地區的帝國主義勢力。所有這一切的邪惡都是肇因於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體制。但這不是說左翼學者不贊同現代化的生產，他們只是認為按照毛的方式，即依賴群眾而不是國家的力量，可以更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以及人性化的訴求，達到現代化所預期的合理與有效的生產結果。[30]

1971 年，韓丁幾經波折，再赴張莊蹲點調查。他像當時獲准在官方監督下參訪的西方左翼學者一樣，並非不知道中國官方所刻意

Chinese Collectivisation Campaigns of 1929-30 and 1955-56," pp. 1-47.

28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pp. 108-109.

29 Thomas P. Bernstein,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pp. 339-377.

30 Stephen Andors, "R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pp. 394-395.

隱藏起來的黑暗面，卻寧可關注光明面。[31]在根據此次參訪所撰寫出版的《深翻》一書中，韓丁稱頌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發掘出蘊藏在人民中的生產潛力，「合理深翻」就是農民依據其經驗總結出的一種生產方式。即使在大躍進時期，由於下層幹部的官僚主義，強迫推動不合理的深翻，造成重大災難，但這並不能動搖農民對深翻的信仰。在這裡，深翻象徵的是那看似落後，卻充滿革命精神與智慧的底層群眾。就像書中一位農民所言：「有時候最落後的人最聰明。」[32]這透露了作者對毛的信仰，以及對現代化的懷疑。

毛澤東並沒有因為大躍進的失敗而放棄，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對新中國官僚主義再發起的挑戰，大寨模式則被認為是毛的群眾路線在文革時的具體代表。根據中共官方說法，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生產大隊是一個貧困山區的落後村莊，村內階級矛盾嚴重。該村在 1945 年推動土改，並在雇工出身的黨員陳永貴的領導下，成立了互助組。1951 年與 1955 年，村裡又先後成立初級社與高級社。隨後，接二連三的天然災害，幾次摧毀了農民辛苦的成果。但大寨農民在陳永貴的領導下，永不放棄，他們還拒絕了國家的援助，只是靠著自己的兩隻手，齊心協力重建家園。1964 年，毛正式向全國號召：農業學大寨。大寨成為全國農村競相學習的典範。周恩來也附和說：「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這就是大寨精神。[33]

以上只是當時中共官方的宣傳。我們今天已經知道，沒有國家

31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 90.

32 William Hinton, *Shenfan*, pp. 737, 742.

33 山西省《大寨》畫冊編輯組，《大寨——中國農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頁 i-vii。

的援助，大寨不可能創造傳奇。[34]韓丁當時恐怕也知道了此一事實，他的書中便引用周恩來的一段話：「大寨並不是完全依靠自力更生的典型，而是自力更生為主的典型。」[35]然而，大寨精神標榜的自力更生、無私奉獻，依舊擄獲了左翼學者的心。[36]平心而論，考慮到毛時代中國的落後與孤立，直到今日，學者也不否認，毛的群眾路線式農業集體化運動，對農業的持續增長不是完全沒有貢獻。[37]只是當時的左翼學者沒有突顯此一路線的局限與副作用。

終於，獨木還是難撐大局。毛澤東當時為階級敵人包圍，甚至連他所依賴的農民，「在某種程度上，全部帶有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還私下期許集體經濟不要那樣強，好使他們能夠在弱肉強食的競爭中發家致富。[38]如此也難怪大寨模式會吸引左翼學者，因為大寨的一個口號就是「割資本主義尾巴」，如取消自留地和關閉農村貿易點等。今天我們也已經知道了，這些政策帶給農村極大的傷害。[39]

但是，阻礙革命的絆腳石，主要還是新中國的官僚主義。韓丁悲嘆建國後的中共，失去了游擊戰爭時期的群眾精神，變得愈益官僚化，就像嶄新的政府辦公大樓所展現般，外表現代化的建築，骨

34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p. 186.

35 William Hinton, *Shenfan*, p. 682.

36 Edward Friedman, "The Innovator," p. 307.

37 就農業技術來說，1950 年代的中國並無太大的突破，頂多只是藉由改變勞動組織方式，以提高生產力。自大躍進以來，中國農業的技術因為國家投資的增加，才有重大的突破，如拖拉機與商業肥料使用的增多。但是，儘管農業生產的持續增長，由於大躍進的重創、人口的不斷增加，以及國家的剝削居高不下等原因，農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相應的提高。Robert Ash, "Squeezing the Peasants," pp.105-144.

38 William Hinton, *Turning Point in China*, pp. 25-26.

39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837。

子裡不過是舊衙門的再現，所以共產中國的官僚化是中共盲目追求現代化的產物，也是封建主義的遺產。在裡面辦公的共黨幹部，是現代版的士大夫，也是毛澤東主要的敵人。因為此一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如此龐大，毛的失敗幾乎不能避免，甚至毛自己也成為此一體制的一部分。因此，在毛死後，逆流終於氾濫。[40]

《深翻》一書出版於 1980 年代初期，當時西方的共產中國研究已開始發生轉變。如在 1970 年代後期，左翼學者仍相信 1955-1956 年的社會主義高潮，如毛澤東宣稱般，是由於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在農民自發與自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41]然而，到了 1980 年代初期，左翼學者也不禁懷疑，此一高潮時期，是否正是中共開始背離他們向來所強調的自發與自願的群眾路線之關鍵階段。同時期的弗里曼(Edward Friedman)也認為，自社會主義高潮以來，毛愈益把國家的利益放在群眾利益之上，與斯大林已不是那麼不同了。[42]由此可見，左翼潮流已開始逐漸地沒落。

在今天，或至少從 1990 年代開始，學者們也不再像過去那般頌揚毛澤東了。如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所言，毛的群眾路線並非真的要由群眾來作決定，而是要群眾相信黨和領袖的決定對他們是最好的。施拉姆還批評毛即使已知道大躍進的結果會造成災難，但仍堅持推動，因為那是他提出來的政策。但施拉姆也反對那些對毛完全負面的批評。他承認毛是個暴君，但中國在他領導下確實也強盛起來；他批評毛是個專制君主，但也是毛有意無意地把黨國權力下放，使

40 William Hinton, *Shenfan*, pp. xxiii, 93, 164-165, 200-204, 254-255, 378-379, 766-767.

41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pp. 148-149.

42 Mark Selden and Victor Lippit, eds.,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下層幹部與群眾擁有更多的「民主」。[43]此民主當然與西方學者所期望者大異其趣，但也給了學者無限的想像空間。如後所述，在 1980 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無論中共是否在建國後日益背叛他們原初的群眾路線，但中共黨國的權力本來就不是無限的，底層幹部與群眾主要仍是依循其長期以來的慣習生活著。

四、革命與既存自然秩序的妥協

我們說，底層幹部與群眾主要是依循其長期以來的慣習生活，並不是說上層黨國政策對他們毫無影響，而是說基層農村生活的變遷，並非上層黨國政策的直接反應。

白維廉(William L. Parish)與懷特(Martin King Whyte)在 1970 年代末期的研究就指出，共產中國農村的改變，並不是單純對政府壓力的回應。他們並非完全否認國家的影響，毋寧說國家的影響只是間接的。如中國農村自由婚姻的普遍，是因為在集體制下，男女交往機會增多的緣故。所以，1950 年代的中國農村確實發生相當大的變動，但作者說這是由於當局政策符合多數群眾的利益與既存秩序的緣故，一旦 1960 與 1970 年代國家的政策背離地方的實際情形，就不再那麼容易獲得貫徹了。[44]在這裡，白維廉等人並沒有去探討上層的政策，而是聚焦下層。他們意圖證明，無論上層如何改變，下層的革命仍有意無意地與「既存自然社會秩序妥協」。白維廉說，這也是中國的農業集體化所以比蘇聯者更令人易於接受的地方。[45]

---

43 Stuart R. Schram, “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 pp. 125-143.

44 William L. Parish and Martin King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155-199, 320-323.

45 William L. Parish, “Introduction,” pp. 4-5. 白維廉此論文指出，除了大躍進

把視角從上層轉移到地方社會文化，這是 1980 年代後西方中國研究的普遍現象。深受白維廉等人影響的史黛西(Judith Stacey)，也是一個例子。史黛西說，很多 1970 年代西方左翼婦女史的研究者，非常失望地發現中共為了贏得農民的支持，有意無意地支持家父長制的傳統，就像蘇聯般，背棄了他們原初反家父長制的承諾。其具體政策，如依舊以體現家父長制的「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或承認婦女的勞動價值較男性低等。史黛西也證明了除了大躍進時期外，中共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主要還是採取與既存自然秩序(即家父長制)妥協的態度。但這不是否認革命的影響，只是在家父長制的支配下，作者認為，中國農村婦女境況的改善，只能是漸變的。[46]

隨後，很多中國研究者有機會進入中國農村作長期的田野調查。他們發現，共產革命並沒有完全改變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瑟爾密斯・波特(Sulamith Heins Potter)與傑克・波特(Jack M. Potter)關於廣東省東莞縣增步大隊的研究即欲證明這一點。他們指出，共產中國建立的新社會，不外乎是傳統農村宗族秩序辯證的發展，如互助組是在既存機制上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也符合傳統的社會秩序。又，如同白維廉等人般，波特指出中共有意無意地加強了家父長制的傳統。所有這些現象皆證明了，「新的社會主義集體形式，巧妙地嵌置於一個浸透在中國深層文化結構的思維模式中」。[47]

波特等人走得比 1960 年代的施堅雅等學者要遠，因為後者至少還認為人民公社大而無當；1980 年代的學者也顛覆了前一世代的左

時期外，作為共產中國農村基本單位的生產隊與自然村一致，其領導幹部不是外來的國家幹部，而是當地人，他們和農民間很多都是親戚，此即證明革命與既存自然秩序的妥協。

46 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p. 1-5, 203-247.

47 Sulamith Heins Potter and Jack M. Potter, *China's Peasants*, pp. 1-70, 251-269.

翼觀點，因為他們不再把中國共產革命的群眾性格歸咎於上層的領導，而認為那是歷史發展、文化結構影響下的必然性。

徐維恩(Vivienne Shue)是一位橫跨1970與1980年代的中國農村研究者。她在 1980 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1956 年以前中共的農村政策獲得驚人的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共領導顧及農民的利益，執行緩和且能為群眾接受的階級路線，並適當地下放權力給地方，使基層幹部與群眾可以參與政策決定，甚至容忍地方一定程度的各行其是，以維護地方自身的利益。[48]此一論述顯然反映了 1970 年代左翼觀點的影響。

在 1988 年出版的著作中，徐維恩延續了前書的觀點繼續發揮，但她現在認為上述現象既是中共有意無意促成的結果，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作者在書中把中共農村幹部類比成傳統士紳：中國士紳固然要仰仗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及其儒家意識形態和功名制度，但也必須依賴非正式的地方資源，才足以維持自身的地位與完成任務。所以，士紳也要照顧地方的利益，不能完全站在國家一邊。

共產中國繼承了此一遺產，而且，據作者所言，中共的集體化政策，把中國農村分割成一個個彼此分離的蜂巢狀組織(honeycomb)，即人民公社。此一蜂巢狀的系統，擴大了國家與社會間的鴻溝。因為徐維恩也低估了公社，以為公社規模相當於施堅雅所謂傳統集市網絡，一個自給自足且文化隔離的農村社群。作者指出公社幹部固然是領取國家薪資的「國家幹部」，但因為公社沒有預決算，所以也必須依賴地方的支持才能夠完成任務；再下層依賴地方給養的生產大隊與隊級「地方幹部」，更無庸贅言。這些基層幹部就如同傳統士紳般，要同時顧及國家的政策與地方的觀感，如此也無怪乎常有幹部

48 Vivienne Shu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pp. 321-333.

聯合農民瞞產的情事，地方黑市也一直存在。因此作者斷言，毛澤東時代的集體化政策，有意無意地延續與強化了傳統的農村體制。[49]

徐維恩的著作影響很大，也引起很多爭議，如蕭鳳霞(Helen F. Siu)便不贊同她。蕭根據她在廣東省新會縣的田野調查指出，農村幹部完全是國家的代理人。他們不顧地方觀感，代表國家榨取地方資源，因此在農民眼中，共黨幹部比傳統土豪劣紳更壞。但是，蕭把中國農村描繪成一個被細胞化(cellularized)的社會，這點與徐維恩談的蜂巢狀組織有異曲同功之妙。不同的是，徐強調的是細胞內部的共同性，蕭則著重細胞間的分散性。因為分散，社會才無力抵抗國家，幹部與農民也才會如此依賴國家，結果幹部就成了國家的同謀者，農民也只能任憑幹部魚肉。兩人所談的原來是一體兩面。如同徐把共產中國的地方幹部等同於傳統士紳般，蕭也發現共產中國國家與幹部對農民的無情統治，是源自中國的傳統。蕭在其書序言即說：「我帶著馬克思主義者的期待去中國，卻帶著馬克斯・韋伯最深沉的恐懼離開」。是什麼讓她如此恐懼呢？那就是強大國家與官僚主義的中國傳統之再現。[50]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似乎也向世人印證了蕭鳳霞的憂慮，即共產中國確實仍被那強大國家的傳統束縛。[51]

由此可見，蕭鳳霞和徐維恩兩人都同樣注重中國歷史的內在結構。這一點原來就是 1980 年代學者共同的特性，如前述波特等人亦是如此，他們說結構論者強調的是歷史的延續性，認為既存的歷史秩序對突發事件有免疫力。[52]施堅雅也在 1980 年代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歷史結構的論文，規勸中國的研究者，要從中國大地域系統的

49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pp. 49-71, 75-103, 106-113.

50 Helen F.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pp. xxii, 1-14, 169, 291.

51 井尻秀憲，《現代アメリカ知識人と中国》，頁 164。

52 Sulamith Heins Potter and Jack M. Potter, *China's Peasants*, p. 251.

內在結構去探索中國歷史，他的觀點對蕭、徐二人有很大的影響。[53]

當時許多學者也如同上述諸人般，試圖從中國歷史傳統中尋找依據，探究共產中國統治的特質。如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 Jr.)就把毛澤東比喻成朱元璋，一個只能依賴非正式的國家代理人去統治地方的有限的專制君王。[54]黃宗智也說共產中國因為繼承了過密化的小農經濟基礎，使得強大國家傳統的延續成為可能，因為分散的小農不能抵禦強大的國家，更遑論滲透力強的黨組織系統。但是，在關注強大國家的同時，黃也注意到基層幹部的兩面性。他們既要忠於國家，也要顧及農民，左右為難。如此也難怪沒人願意當生產隊長，所以該職位通常變動性不大。[55]

可是，這樣的論證，最後結論若不是像徐維恩般強調國家的局限，就是像蕭鳳霞一樣突顯國家的強大。後來的學者想把這兩個對立的論述結合起來，如戴慕珍(Jean C. Oi)即試圖證明非正式的自然秩序與關係本來就是正式的國家統治的一部分，共產中國亦是如此。舉例來說，基層幹部可以透過拉關係等方式，在統購統銷時與上面討價還價，或得到更多貸款。[56]把非正式的關係當成正式國家統治機制的一部分來看待，就解決了徐維恩與蕭鳳霞般非此即彼的對立論證。

戴慕珍雖澄清此現象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但在中國農村中，與政治掛勾的非正式關係，很多都反映了既存地方傳統文化。像是黃樹民《林村的故事》中那對外來移民吳明與吳良兄弟，他們在國民黨時代聯絡國軍與日軍，共產中國時又投靠共軍，在村裡結黨營私，

53 G. William Skinner,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pp. 271-292.

54 Frederic Wakeman, Jr., “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 pp.75-76.

55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pp. 187-192, 321-322.

56 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與在地的林家人敵對，既反映土客衝突與村裡的派系糾紛，也突顯出階級和政治的矛盾。[57]這也呼應前述 1980 年代諸位學者普遍持有的一個論點：共產中國並未擺脫既存歷史結構，和自然秩序的束縛。

陳佩華(Anita Chan)、趙文詞(Richard Madsen)、安戈夫(Jonathan Unger)關於廣東陳村的田野調查，提供給我們一幅更複雜的圖像。以支書陳青發與生產大隊隊長陳永龍為首的兩個敵對派系，一直是村裡政治運動的焦點，黨的政策、意識形態與私人關係和恩怨，糾纏不清。農民也學會了選邊站，他們參加鬥爭幹部，「全是出於私人的原因，沒有人喜歡毛的階級鬥爭的理由」。那些一開始帶著滿腔革命熱誠下鄉的青年，也不由自主地捲入村裡的派系鬥爭，並逐漸地變成現實政治鬥爭的能手。改革開放後，陳村經濟蓬勃發展，傳統宗族文化復甦，所有過去一切荒謬的鬥爭和仇恨，也煙消雲散。[58]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好似一段脫序演出，歷史到頭來還是回到其正軌。

階級鬥爭只是一段歷史的脫軌，這已成為 1980 年代以後許多西方中共黨史研究者普遍接受的看法。他們認為，階級壓迫不是中國農村社會的主要矛盾，革命奪權時期的中共非常了解這一點，所以他們「因地制宜」地修正了外來的革命綱領，用抗稅和保衛家園取代了階級鬥爭，贏得農民的支持。但是，自抗戰結束以來，中共以激烈的階級鬥爭替換過去靈活的因地制宜政策，結果就帶來了災難。[59]中共違背了他們原初的承諾，背離了實際與農民，脫離了中國歷史的

57 Shu-min Huang, *The Spiral Road*. 按，林村位於廈門。

58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本書作者最初是於 1970 年代後期赴陳村調查，1984 年出版本書。之後作者於 1988-1990 及 2006-2007 年再訪陳村，並先後兩次修改再版該書。

59 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p. 31; Philip C. C. Huang, "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105-143.

正軌。但是，如前面波特等人所設想般，歷史有其強韌的延續性，不會輕易地因為突發事件而中斷。

五、國家與農民的戰爭

迄此為止，我們可以發現西方的中國農村研究到了 1990 年代前夕，愈益貶低外來的國家的影響，並同時逐漸地抬高既存的地方因素。在 1990 年代以後，這兩個面向日益顯著，乃至形成國家與農村社會二元對立的觀點。

前述的左翼學者弗里曼、塞爾登在 1970 年代時非常崇拜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並批評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正義，及其野蠻的帝國主義行徑。可是，到了 1980 年代，弗里曼等左翼學者也開始質疑、批評毛澤東與中共當局。在一篇比較斯大林、毛澤東，以及南斯拉夫的鐵托的文章中，弗里曼批評斯大林激進的階級路線，以及對黨國權力的過度依賴。與此相反，他讚揚鐵托能夠建立廣泛的民族主義統一戰線，也較注意群眾的實際需要，不會堅持太激進的階級路線。這幾點，實際上就是塞爾登在延安模式一書中所述「寧靜革命」觀點的重覆。不同的是，在中共黨內代表此一路線的不再是毛，而是周恩來、陳雲等人。毛反倒成為一個頑固的斯大林派，自 1955 年下半年以來，放棄了過去主張自願與漸進的路線，強力且急迫地推動社會主義。[60]塞爾登後來討論中國的農業集體化及其與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比較時，也採取了與弗里曼同樣的看法。[61]

隨後，弗里曼對毛澤東的批評愈益激烈。他指責毛不民主，建立了一個腐敗的、依靠私人關係維繫的統治團體；毛時代的中國社

60 Edward Friedman, “Maoism, Titoism, Stalinism,” pp. 159-214.

61 Mark Sel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pp. 54-60.

會也不平等，還加深了階層化；大躍進的犧牲者，遠超過斯大林集體化運動的受害者。[62]弗里曼還說毛所採取的是列寧、斯大林一貫堅持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即為了應付戰爭的需要，持續不斷地動員與榨取農民。毛的中國也不是什麼現代化的官僚政權，而是像傳統中國般，一個依靠私人關係維繫，既封閉又貪污腐敗，還充斥著派系鬥爭的封建政權。[63]

上述的觀點，後來都被弗里曼、塞爾登與畢克維(Paul G. Pickowicz)用於河北省饒陽縣五公村革命史的個案研究中。根據中共官方的歷史，五公村在 1949 年以前，也是一個充斥著階級矛盾的貧窮村落。村民在貧農耿長鎖的領導下，很早就開始自發性的抗爭。抗戰時期，中共在五公村建立政權，推動減租減息等漸進的改革政策，並在自發與自願的基礎上成立土地合夥組，集體經營農、副業。這彷彿就是塞爾登延安模式的翻版。所以，關於這一段五公村的歷史，弗里曼等人的觀點與中共官方歷史並無顯著不同。[64]

可是，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兩者的差距愈形擴大。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自抗戰結束後的土地改革以來，五公村內部的鬥爭，從反封建逐漸轉變成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耿長鎖則是毛澤東的忠實追隨者。可是弗里曼等人自 1978 年著手進行五公村研究以來，其主要關懷一直是國家與村莊間的關係。[65]他們以為，自土地改革以來，寧靜的革命逐漸讓位給

62 Edward Friedman, “The Flaws and Failures of Mao Zedong’s Communist Fundamentalism,” p. 149.

63 Edward Friedman, “Was Mao Zedong a Revolutionary?” pp. 208-209, 212-214.

64 中共官方的觀點，參見南開大學歷史系、五公大隊村史編寫組，《五公人民的戰鬥歷程》；弗里曼等人的說法，參見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65 Paul G. Pickowicz, “Rural Protest Letters,” p. 48.

暴力的階級鬥爭。作為黨國代表的耿長鎖，也利用階級鬥爭，打擊異己，透過私人關係建立了一個既得利益的統治團體。

中共建國以後，五公也像大寨般，響應政府的號召，先後成立初級與高級社，其集體化的進程也被當成典範予以宣傳。但據弗里曼等人所言，這一切成果與國家的援助不無關係。他們指出，在 1950 年代中期以前，由於統購統銷等政策，農村已經出現困難，但五公與上級的關係較好(河北省委書記林鐵是五公的靠山)，所以他們可以獲得比周圍其他村莊更多的資源，平穩且富裕地渡過。就像前述的戴慕珍般，弗里曼等人也把非正式關係當成國家正式統治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弗里曼等人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承襲了 1980 年代學者的關懷，即革命與自然秩序的妥協，可是他們對中共黨國的批判，卻變得更加嚴厲。弗里曼等人承認，在中共奪權時期，革命與中國傳統裡好的一面如度蜜月般結合在一起，所以也帶來好的結果。可是，中共建國以後，傳統裡壞的一面，如耿長鎖依恃私人關係建立一個既得利益的統治集團，愈益突顯。甚至在 1950 年代中期後，急進的集體化政策和傳統中最糟糕的面向結合一致，如幹部把吹噓拍馬當成理所當然，「上級放個屁，下級當本戲」，最後終於導致大躍進等災難爆發。

再一點不同的是，弗里曼等人的著作比 1980 年代的研究更為細緻，這當然是拜中國農村與史料愈益開放之賜。2005 年，弗里曼等人出版了五公村研究的續集，繼續探究 1960 年代以來五公村的革命史。[66]全書還是以耿長鎖為中心，作者抽絲剝繭地把村內外政治上的恩仇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愛恨，詳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像是耿長鎖

66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Mark Selden,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在大躍進末期與文革初期的起落，村民對耿及其夥伴的擁戴與仇恨，還有五公村與其上層靠山林鐵和劉少奇的分合。據弗里曼等人所言，五公村在文革時極力竄改歷史，以撇清與劉少奇和林鐵的關係。但是在文革後，塞爾登等人來訪時，耿又要求作者不要把他們過去批評劉少奇的那段歷史寫出來，因為他們那時已和過去的靠山、現在的改革派林鐵恢復了關係。這也就證明前述弗里曼的觀點，即共產中國是一個靠私人關係維繫，充斥貪污腐敗與派系鬥爭的封建政權。

1990 年代以來的農村研究雖然在論述上變得更加細緻與瑣碎，但幾乎每本著作背後都隱藏著一幅宏大的圖像，即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無論上層的派系與政治人物孰起孰落，農民永遠是最大的受害者。大躍進時，五公村民把「朱毛」聯繫到世紀初一則關於豬與貓將帶來災難的預言。[67]文革時，村民向外來的紅衛兵控訴耿長鎖為了滿足國家的要求，罔顧人民的利益，但紅衛兵只想挖掘耿反革命的罪證，完全無視農民對國家的不滿。如畢克偉所言，這是國家對農民的開戰，借用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話來說，是城市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農村社會的較量，農民只能訴諸那帶有傳統意味的日常生活的抗爭，又稱為弱者的武器，抵禦立足城市的國家之外來侵入，求得生存。[68]

---

67 此段記載是引自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p. 273. 中國大陸的譯本：弗里曼、畢克偉、塞爾登著，陶鶴山譯，《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一書卻漏譯了這一段。又，英文版提到大躍進時國家大量動員漢人到內蒙古工作，蒙民視此為對他們土地、文化和命運的威脅，因此想念日本侵略者。(p. 220)後面這句話，中譯版也漏譯了。

68 Paul G. Pickowicz, "Rural Protest Letters," p. 47. 應該注意畢克偉此一說法的嚴重性。前面提到的左翼學者，如 Thomas P. Bernstein,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pp. 347-348，在論及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差異時曾指

日常生活的抗爭，是指作為弱者的農民，在國家的高壓統治下，為求得生存所採取的某種小規模且不易被察覺，又是永恆並持續不斷的日常鬥爭策略，像是五公村民所採取的如偷盜、怠工等手段。事實上，這並不是 1990 年代學者的創見，徐維恩、戴慕珍等 1980 年代的學者早就指出地方幹部會與農民聯手進行黑市或「軟抗」等行動。所以，斯科特理論的運用，正透露了左翼觀點一直或多或少地影響著西方中國農村革命史的研究，成了此一群體共通的話語。

撒克斯頓(Ralph A. Thaxton, Jr.)是借用斯科特理論研究中國革命的箇中翹楚。撒克斯頓原來也是一位左翼學者，非常同情中共與底層群眾。1997 年出版的《土鹽》一書承襲了他長期的左翼關懷，述說具有和國家長期對抗歷史的冀南地區鹽民，如何與被全球資本主義所激勵的國民黨政權對抗。而中共所以成功，關鍵在於他們能否與鹽民反國家的傳統結合，而不是依據外來的意識形態發動階級鬥爭。[69]全書反映了斯科特道義經濟學等理論以及塞爾登延安模式的影響，同時也暗示了，中共一旦成為統治者，也會走向群眾的對立面。

果不其然，在 2008 年所出版關於 1949 年後河南省南樂縣千佛村革命史的研究中，[70]撒克斯頓一開始就嚴厲批評毛澤東一直懷抱激進的理想，而且毛已習慣了大規模的傷亡，以致他後來毫無顧忌地以饑荒為代價來榨取農村。這一點也反映了 1990 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毛澤東信仰的破產。又，本書實際上是《土鹽》一書的續集，只是在

出，斯大林相信國家與農民處於戰爭狀態中，故應毫不留情地榨取農民，但毛的共產中國沒有這樣做。如今畢克偉說毛時代的國家也對農民開戰，無異是指控毛的中國與斯大林的蘇聯無異。

69 Ralph A. Thaxton, Jr., *Salt of the Earth.*

70 Ralph A. Thaxton, Jr.,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千佛村在書中是以大佛的化名出現，南樂則以東樂出現。

本書中民眾反抗的對象變成中共，手段上也改採更隱蔽的日常生活的抗爭。據作者所言，中共地方黨員有兩種類型，菁英階層出身者較傾向漸進與寧靜的革命，以包芝龍(Bao Zhilong, 音譯)為代表的流氓份子，則是不學無術者，他們傾向採取暴力的手段。因為菁英出身的黨員在抗戰時或是戰死或被調離，包芝龍集團逐漸壟斷村的領導，並在土改時期，在地方上貫徹毛的「戰時共產主義」，乃至於肆意濫殺人民。從這點我們也可以看出弗里曼對撒克斯頓的影響。

也如同弗里曼等人般，撒克斯頓認為 1950 年代前期是中共黨國與農民的蜜月期。可是，中共自 1953 年後半開始推動的統購統銷政策，破壞了農民間既存的「生存第一」原則(此即斯科特道義經濟學的運用)，也終結了國家與農民的蜜月。最初，農民仍相信毛澤東及包芝龍；到大躍進時期，農民開始透過打油詩或對聯抒發不滿，並採取一些日常生活的鬥爭手段，如怠工、移居、黑市、乞討、偷青、拾青等等，以求生存。但這些行為都不如另一種形式「吃青」有效。吃青是指農民在田間工作時，直接吃生的作物。吃青不易被發現，即使發現，生產隊幹部也會睜隻眼閉隻眼，視而不見。又，吃青是自發的，沒有預先計畫，作者還誇張地說，吃青帶有反抗國家的意味。

吃青有效地挫敗了國家對農村的榨取，毛澤東等上層領導雖然震怒，但下層的公社幹部則因此警覺到要尊重農民生存第一的原則。1961 年後，公社違法地分給農民「紅薯借地」，即自留地，就是對農民讓步。不過，大躍進後，地方主動地對農民讓步，此並非撒克斯頓的創見，楊大力(Dali L. Yang)在 1990 年代即已提出。據楊所言，早在大躍進以前，有些地方就已自發地開始推動包產到戶。中共中央並不允許此一舉措，但也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以至包產到戶在大躍進後，乃至文革時期，一直延續了下來，並成為後來改革開放

的先聲。[71]當代很多學者說中國的改革是由地方帶動全國，即是追溯至這段時期的歷史。

撒克斯頓的著作，就像弗里曼等人的五公村研究般，都是非常細緻、瑣碎的村史研究，而且全書的焦點包芝龍集團，名不見經傳，其代表性與耿長鎖完全不能相比，讓人好奇這樣細緻的村史研究，究竟意義何在？但是，如前所述，撒克斯頓實際上是要用具體的村莊革命史來證實斯科特理論運用在中國研究上的可行性與有效性。而且，就像弗里曼等人般，貫穿整部著作的，也是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概念。在農民看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省級吳芝圃的升級與降級，還是公社幹部包芝龍的倒台與復出，不過是一場又一場的鬧劇。因為，自大躍進以來，中共早已在農民心中失去合法性，儘管上層不斷地試圖介入底層農村的生活，但農民還是依循其長期以來生存第一的原則以及反抗國家的傳統行動。

最後，讓我們舉一位中生代學者的例子，證明上述觀點的普遍性。李懷印在 2005 年出版的關於民國時期河北省獲鹿縣基層農村政權的研究中指出，[72]中國長期以來有最小政府的傳統，即國家任憑地方各行其是，僅在適當時機出面介入。獲鹿縣的鄉地制即體現了此一傳統。作為一位非正式的官方代理人，鄉地既協助政府統治，又充份表達了地方自治，實現了村民間互助合作與維持最低生存的道德需求。此一說法反映了斯科特的道義經濟學理論。

李懷印在接下來關於他家鄉江蘇省東台縣溱村的個案研究中指出，[73]1950 年代前期有限度的農村合作化時期，地方社群仍享有相當的自主性，所以國家與農村能夠維持和諧。但自 1954 年的統購統

71 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pp. 32, 49, 241-242.

72 Huaiyin Li, *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5-1936.*

73 Huaiyin Li,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銷政策與隔年的高級合作化以來，此一和諧關係即慢慢破裂。李懷印走得比撒克斯頓更遠，他說農民訴諸某些既存機制，如宗教等，進行公開的維權(righteous)抗爭，迫使國家退讓。在大躍進失敗後，中共當局開始朝向傳統理想的最小政府體制回歸，農村社群也慢慢地恢復了對自身生活的支配權。李懷印甚至還說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起飛也與此有關，指出當代中國就是因為恢復了傳統的地方自治傳統，才得以重建和諧的社會。此一說法讓人覺得不過是作者把他自己浪漫的空想硬套在中國歷史上，令人不敢苟同。

總結地說，我們可以發現，1990 年代以後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承繼了 1980 年代，乃至更早以前學者的看法，即中國基層農村的歷史主要是依循某種既存的秩序和結構緩慢前進，國家的介入只是短暫且災難的插曲，而且終將退出。這背後隱藏的是一幅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大框架。如果 1980 年代的學者還只是含蓄地透露此一看法的話，1990 年代後的學者則是露骨地指出國家與農民是處於對抗，乃至於交戰的狀態下。

六、結論

根據本文的考察顯示，西方學者研究共產中國時，一開始就注意到中國內部與地方的因素。如 1950 年代的魏特夫認為蘇聯與共產中國是建立在傳統東方社會基礎上的專制政權。1960 年代的學者如施堅雅等人雖然憧憬現代化的社會，但也發現因為傳統的制約，中共難以貫徹現代化的改革。他們甚至開始欣賞某些中國傳統的特色，如被認為是自給自足的集市網絡等社群，甚至主張中共某些政策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脫離了這些傳統機制。

到了 1970 年代，左翼學者們更進一步地主張，中共領導(主要是毛

澤東)是有意地走更能夠反映中國地方實際的群眾路線，反對不公不義的現代化國家官僚體制。雖然 1980 年代以後，學者發現，即使最革命的毛澤東，也早就背叛了群眾。但是，基層幹部與底層群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是依據既存的社經自然秩序生活，而不是根據中共的政策或意識形態行事。這些學者並不反對共產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但他們認為中共的專制性格也是來自中國傳統。到了 1990 年代後，學者們更進一步地把國家與社會對立起來，指出中共就像斯大林一般，為了國家的利益向農民宣戰；農民也秉持著他們一貫的傳統，抵禦國家的入侵。

這種論述只是西方特有的嗎？並非如此。如日本學者石田浩、內山雅生等人，也非常關心共產中國農村「共同體」的研究。[74]農村共同體向來是日本學界中頗具爭議的一項議題。主張中國農村存在共同體的學者，咸把村落當作獨立的既存社群，把國家當成外部的因素來看待。中共施政的成敗，如田原史起所指出的，也反映在如公社般代表國家立場的體制(構成的自治)與像自然村般既存的機制(生成的自治)間的結合與分離，這不由得讓人聯想起前述施堅雅等人的研究。當然，田原等當代學者的研究更細緻，他們也有日本學界自己的傳統。[75]這也提醒了我們，不論西方或東方的學者，一開始就沒有忽略中國內部的因素。

筆者以為，中國農村革命史研究的日益地方化，本身並無可厚非。但如上所述，此類觀點走到極致，就會得出國家與社會二元對

74 石田浩，《中国農村社会経済構造の研究》；内山雅生，《現代中国農村と「共同体」》。

75 田原史起，〈村落統治と村民自治〉，頁 85-117。田原在文中亦指出，他關於「構成自治」與「生成自治」的概念，是來自清水盛光在 1939 年發表的著作。

立的偏頗結論，事實上是站在社會的一邊批判中共黨國。我們忘了社會對國家的反抗本身也許就是中共統治的一部分，就像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說的，「革命的威權體制需要社會方面在國家許可的範圍內積極參與」。[76]在共產中國的諸多政治運動中，中共煽動群眾起來表達不滿，乃至鬥爭幹部，但結果這些運動並未危及中共當局的統治。相反地，中共利用這些運動，反覆地向幹部及群眾灌輸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並依據此一意識形態，縱向地把整個中國撕裂開來，使其政權建立在此一分裂的基礎上。[77]由此看來，我們如果太過執著於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不是會因此忽略其他更重要的面向嗎？

又一點值得吾人省思者。由於史料的愈益開放，以及田野調查的普遍，越來越多的研究都是以村為焦點。像是弗里曼的五公村，撒克斯頓的千佛村般，都是村史研究。這些學者上山下海找資料的精神，著實令吾人佩服；其著作中描繪的細節，更是讓人望而興嘆。但是，也令人擔憂的是，這樣的研究是否太瑣碎化了。原來，在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於 1984 年發表後，就有學者質疑他的觀點會不會使歷史研究喪失宏觀的視野。但柯文直到 1990 年代末仍回應說，現在想這個問題太早了。[78]但也許已經遲了。何漢理在 1990 年代初回顧日益蓬勃發展的地方研究時，就感慨地說，我們「對局部的認識已超過對整體的理解」。他說只有重新再對整個共產中國進行評價，共產中國的研究才可能獲得更多的共鳴，並與其他學科進行交流。[79]當然，筆者並不是反對微觀的地方史研究，歷史研究更

76 Elizabeth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pp. 21-22.

77 陳永發稱此為「被控制的二元分化」，參見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78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p. 187.

79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pp. 30-31.

不能脫離實際去空談理論。但我們不要把自己的視野局限在一個地方，乃至一個村莊。就像施堅雅所言，考慮到中國有九十幾萬個村莊，那些設想一個接著一個村莊進行田野調查的研究方式，既不切實際，也沒有前途。[80]如前所述，施堅雅也作田野調查，他也從事底層的村落、集市研究，但他的視野卻超越了農村，心胸懷抱的是整個中國，乃至全世界，也許這也正是他的觀點迄今仍影響著共產中國農村研究的緣故吧！筆者也期許自身與諸位研究中國農村革命史的同好，將來都能像施堅雅般，成為超越農村的農村研究者。

(本文於 2012 年 2 月 23 日收稿；2012 年 5 月 31 日通過刊登)

*本文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回首民國百年學術研討會」(臺北，2012 年 1 月 11-13 日)，撰寫與修改期間，承蒙劉季倫教授與《新史學》匿名審查人和編輯委員惠賜許多寶貴建議，特此致謝。

80 Donald R. DeGlopper, “The Anthropologist without a Village,” p. 18.

徵引書目

山西省《大寨》畫冊編輯組編，《大寨——中國農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

弗里曼、畢克偉、塞爾登著，陶鶴山譯，《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南開大學歷史系、五公大隊村史編寫組，《五公人民的戰鬥歷程》，北京：中華書局，1978。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楊慶堃，〈鄒平市集之研究〉，北京：燕京大學社會系碩士論文，1934。

井尻秀憲，《現代アメリカ知識人と中国——知と情念のフロンティア》，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2。

石田浩，《中国農村社会経済構造の研究》，京都：晃洋書房，1986。

田原史起，〈村落統治と村民自治〉，天児慧、菱田雅晴編，《深層の中国社会》，東京：勁草書房，2000，頁 85-117。

内山雅生，《現代中国農村と「共同体」》，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3。

Andors, Stephen. “R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Man and Machine in Industrializing Society, The Chinese Case,” in Edward Friedman and Mark Selden eds., *America’s Asia: Dissenting Essays on Asian-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pp. 393-444.

Ash, Robert. “Squeezing the Peasants: Grain Extraction, Food Consumption and Rural Living Standards in Mao’s China,” in Julia Strauss ed., *The History of the PRC (1949-19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5-144.

Barnett, A. Doak.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0.

Barnett, A. Doak,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Bernstein, Thomas P. "Leadership and Mass Mobilisation in the Soviet and Chinese Collectivisation Campaigns of 1929-30 and 1955-56: A Comparison," *The China Quarterly*, 31 (Jul.-Sep. 1967), pp. 1-47.

Bernstein, Thomas P.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3:3 (May 1984), pp. 339-377.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hen, Paul A.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DeGlopper, Donald R. "The Anthropologist without a Village: Reflections on the Work of G. William Skinner,"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8:1 (Mar. 2010), pp. 15-26.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Friedman, Edward. "The Innovator," in Dick Wilson ed.,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00-320.

Friedman, Edward. “Maoism, Titoism, Stalinism: Som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Maoist Theory of the Socialist Transition,” in Mark Selden and Victor Lippit eds.,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1982, pp. 159-214.

Friedman, Edward. “The Flaws and Failures of Mao Zedong’s Communist Fundament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8 (Jul. 1987), pp. 147-154.

Friedman, Edward. “Was Mao Zedong a Revolutionary?” in Edward Friedm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pp. 208-232.

Friedman, Edward, Paul G. Pickowicz,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Friedman, Edward,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Harding, Harry.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pp. 14-40.

Hinton, William.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

Hinton, William. *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Hinton, William. *Shenfan: 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Huang, Philip C. C.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Huang, Philip C. C. "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al and Objective Realities from the Land Refor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1:1 (Jan. 1995), pp. 105-143.

Huang, Shu-min. *The Spiral Roa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Kuo, Tai-chün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Li, Huaiyin, *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5-193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Li, Huaiyin.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 History, 1948-200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dsen, Richard.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Meisner, Maurice.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Meisner, Maurice.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Oi, Jean C.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arish, William L.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rrent Issues," in William L. Parish ed.,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85, pp. 3-29.

Parish, William L. & Martin King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ickowicz, Paul G. "Rural Protest Letters: Local Perspectives on the State's Revolutionary War on Tillers, 1960-1990," in Ching Kwan Lee and Guobin Yang eds.,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1-49.

Potter, Sulamith Heins and Jack M. Potter.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Saich, Tony.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2n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Schram, Stuart R. "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 The Legacy of a Ruler," *The China Quarterly*, 137 (Mar. 1994), pp. 125-143.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2nd e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Selden, Mar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Selden, Mark.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Selden, Mark and Victor Lippit eds.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1982.

Shue, Vivienn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Shue, Vivienn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Siu, Helen F.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Skinner, G. William.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I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3 (May 1965), pp. 363-399.

Skinner, G. William, "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3:3 (Jul. 1971), pp. 270-281.

Skinner, G. William.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 (Feb. 1985), pp. 271-292.

Skinner, G. William and Edwin A. Winckler. "Compliance Succession in Rural Communist China: A Cyclical Theory," in Amitai Etzioni ed., *A Sociological Reader on Complex Organiz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pp. 410-438.

Stacey, Judith.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Thaxton, Ralph A., Jr. *Salt of the Earth: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Thaxton, Ralph A., Jr.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Vogel, Ezra.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Wakeman, Frederic, Jr. "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839-1989," in Kenneth Lieberthal et al. eds.,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1, pp. 68-102.

Whyte, Martin King. "Iron Law Versus Mass Democracy: Weber, Michels, and the Maoist Vision," in James Chieh Hsiung ed., *The Logic of "Maoism": Critique and Explic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74, pp. 37-61.

Wittfogel, Karl A.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Wittfogel, Karl A. *Agriculture: A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Society Past and Present*.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0.

Yang, C. K.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59.

Yang, C. K.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59.

Yang, C. 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Yang, C. K. "Introduction," in Max Weber, Hans H. Gerth translated and edited,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p. xiii-xliii.

Yang, Dali L.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Yang, Martin C. *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A Critical Overview of Wester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Rural Revolution in Mao's China

Yao-huang Che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y of Sinica

Many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discovering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standpoints of Chinese themselves. In f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eld of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1950s, scholars have never neglected the historical dynamics from within China. Since the 1980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has become mainstream in the field of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What are its origins,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fifty years on the history of rural revolution in Mao's China.

Key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of rural revolution,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local studie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